

旅行伦理学和文学伦理学视阈下的亨利·詹姆斯 旅欧小说

Henry James' Novels in the Contexts of Travel Ethics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田俊武 (Tian Junwu)

内容摘要: 亨利·詹姆斯的旅欧小说, 具有鲜明的旅行伦理和文学伦理意识, 表现美国人在欧洲旅行以及与旅居国人民的伦理冲突。由于自身的伦理向度与旅居国的伦理环境的格格不入, 这些来自美国的旅行者, 不管是天真烂漫的美国姑娘, 还是具有一定世俗阅历的中年男人, 都在欧洲旅行路途中经历过某种程度的伦理认知, 有的甚至付出死亡的代价。揭示詹姆斯小说中的欧洲旅行叙事和主人公的伦理认知, 对于认识小说家的小说叙事特征和“国际题材”主题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亨利·詹姆斯; 旅欧叙事; 旅行伦理学; 文学伦理学; 国际题材

作者简介: 田俊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美富布赖特学者,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美国二十世纪小说中的旅行叙事与文化隐喻研究”项目编号【18FWW00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Henry James' Novels in the Contexts of Travel Ethics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Henry James; European journey narrative; travel ethic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national theme

Abstract: Henry James' novels of European journey are characteristic of travel ethics and literary ethics, representing Americans' travel in Europe and their ethical conflicts with the local people. Because their ethical mentalities are irreconcilable with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sojourn, the American travelers, whether they are innocent girls, or middle-aged men of worldly experience, all undergo a certain ethical recognition during their journey in Europe, some of them even paying the price of life. The revelation of European journey in Henry James' novels and the ethical recogni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novelist and the true nature of his international theme.

Author: Tian Junwu, Professor and Ph. 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Sino-US Fulbrighter. His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tjw1966@163.com).

人类学家彭兆荣认为：“旅行作为人类经验和知识的重要来源，作为人类一个恒常性的表述范式，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便会轻易地发现，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主题都与之有涉……”（彭兆荣 36）。与旅行同样古老的是伦理学。聂珍钊指出，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亚里士多德，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之前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等（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 65）。将旅行与伦理结合起来研究，是当下国际上研究的热点之一。由考瑞恩·福勒（Corinne Fowler）、查尔斯·福斯迪克（Charles Forsdick）等人主编的论文集《旅行和伦理学：理论与实践》（*Travel and Ethics: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是旅行与伦理学跨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探讨旅行的伦理意义、旅行者的伦理身份、旅行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伦理冲突、主动凝视和被动凝视之间的张力等。亨利·詹姆斯是美国 19 世纪著名小说家之一，其“国际题材”作品主要讲述欧美之间的旅行以及跨文化冲突，这种跨文化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欧美之间伦理意识的冲突。因此，用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理论去阐释詹姆斯旅欧叙事中的文化冲突，就极具跨学科研究的意义。

一、亨利·詹姆斯的旅欧经历与文学伦理发现

拉吉·豪瑟在评论詹姆斯小说的特征时指出：“他的早期生活，毫无疑问地对他的小说情节的架构和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Houser 9）。豪瑟所言的詹姆斯早年生活主要是旅行。在詹姆斯生活的时代，“每个人都想到欧洲去……邮船以每周载四、五千人的速度把美国人从这个国家的各个港口带出去”（Twain 27）。当时美国的许多上层家族，都曾不断地在罗马、伦敦、巴黎等欧洲城市旅行。从出生的第一天起，詹姆斯就与欧洲旅行结下不解之缘。“从童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运动，随着父母在英国、法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旅行”（Haralson & Johnson 4）。成年后的詹姆斯更是常年在欧洲旅行，先后游历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

“旅行不是詹姆斯存在的第一条件，但它是詹姆斯存在的第二条件却是毫无疑问的。他的 80 年生涯已经形成一个传奇，他已经成为自我流放者、移居国外者和美国文学自愿逃跑者的典型例子”（Zabel 8）。詹姆斯长达 70 年的旅行，使他成为以利用旅行经历而进行文学叙事的现代作家典范。“现代社会是一个躁动不安和流动的社会，旅行、位移、追寻、探索等弥漫在现代社会的文学中，现代作家也在借助这些行为的古老功能来激发个体的和伦理道德的想象”（Zabel 12）。对于詹姆斯来说，远离祖

国、到欧洲大陆的旅行，能使作家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感知生活。正如道文·扎布尔所言，“旅行在他的作品中不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不只是一种浪漫的氛围，任性的冲动，或者一种逃跑主义的诱惑。他是作家的一种伦理道德与历史的戏剧，是他所看到的作为那个世纪根基的文化冲突，是他所发现的‘作为美国人’的一种‘复杂命运’……”（Zabel 13）。詹姆斯意识到美国文化中隐含着一股文化潜流，认为有教养的美国人有责任去发现、审视美国在旧世界的文化和传统遗产。因此，到欧洲去寻找精神的祖先或遗产成为 19 世纪美国人迫切的任务。“实际上，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严肃的作家——梭罗、惠特曼和艾米丽·迪金森除外，都曾经进行过海外旅行。由富兰克林、亚当斯、杰弗逊所发起的对欧洲的探索和审视，被欧文、库柏、爱伦·坡、爱默生、霍桑、麦尔维尔、洛威尔、马克·吐温、豪威尔斯、亨利·亚当斯等以浪漫、批评、怀疑、道义和习得等多元的方式继续下去……但是，只有 19 世纪的旅行者才有更强烈的激情、更亲密的个人需求等优势，而且在那个时代旅行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浪漫教育和伦理道德自决提供了机会”（Zabel 19）。

作为 19 世纪到欧洲旅行的美国作家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自认为有责任在文学创作中将欧美旅行艺术化。“不管那个时代给了他多么大的自由，他作为美国人的角色还是迫使他不要仅做一个旅行的鉴赏者。他要进行比较、评估和判断……”（Zabel 23）。为此，詹姆斯要去接近这个圣地，并将它置于伦理道德的审视和评判之下。“他在欧洲探索的最大价值和益处都展现在自己的小说中。在那里，他的旅行意象呈现出最深刻的洞察力和共鸣性；在那里，他将所看到的风景、城市、纪念碑以及欧美历史与他的人类命运感、生活的悲喜剧以及他所目睹的这个时代里的冲突、邪恶和精神的胜利等戏剧深刻地结合在一起”（Zabel 34-35）。这种基于旅行叙事旨在表现美国人在欧洲经历的小说被评论界定义为“国际题材”小说。艾里克·拉森在阐述詹姆斯的国际主题时说道：“美国人到欧洲去，经历美国伦理身份与欧洲血缘、美国物质主义与欧洲文化主义、美国庸俗与欧洲世故以及美国动态与欧洲僵化的一系列碰撞”（Larson 1）。正如詹姆斯在旅欧途中所观察的那样，欧洲并不总是来自新世界的美国亚当们所认为的天堂。在古老欧洲文明的背后，隐藏着一股阴暗的潜流，与美国文明中的纯洁、实际、自然构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文明不仅将久居欧洲的美国人同化，而且还通过他们对初来欧洲旅行的美国人施加影响，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欧洲伦理文化的牺牲品或者实现某种程度的伦理意识觉醒。正是因为这种国际主题的表达，詹姆斯的小说也便具有了如马克斯·曼切所言的叙事格局：“它反映了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相互误解……那就是一个纯洁、天真的美国女孩到旧世界旅行，遭遇一种腐化的、更严厉的伦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倡导者企图要让她屈服。通常，这位女主人公要通过斗争来保护她的诚实、个人主义和个性的自由不受那个压迫性的、专制社会的束缚……她会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并最终放弃她对一个古色古香、

风景如画的欧洲那种最初的浪漫想象和渴望”(Munch 2)。

二、《黛西·米勒》——米勒小姐的欧洲之行与伦理孤独

《黛西·米勒》关于欧洲旅行的篇幅占据小说的大半,以至于有人诘问这部小说是否类似于马克·吐温的《傻子国外旅行记》那样的旅行记述。其实,这部小说不是旅行日志,而是小说家对欧美两种文化的伦理评判,旅行不过是为这种文化评判提供了叙事平台而已。主人公黛西·米勒,是当时所有到欧洲旅行的美国女孩的典型代表。威廉·豪威尔斯说过:“在1860-1870年间,你在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见到她,听到她的故事”(Howells 66)。作为旅行叙事的标志,《黛西·米勒》一开始就将场景设在瑞士一个美丽的旅游点——韦维小城。虽然在这风景如画的瑞士小城美国女孩黛西·米勒与欧洲青年温特伯恩不期而遇,但是她的欧洲之行并不如这座小城的湖光山色那么宁静美丽。与在欧洲旅行途中所看到的美丽风光呈反讽性对照的是,黛西所遭遇的社会伦理气候是冰冷和容易使人致病的。这一鲜明的反讽甚至可以从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上体现出来。女主人公黛西的英文拼写是 Daisy,指的是四月盛开的“雏菊”,一种散发着生命活力的花卉,象征着美国女孩的天真和清新。男主人公温特伯恩的英文拼写是 Winterbourne,由 winter 和 borne 两部分构成。Borne 在谐音上具有“溪流”的意义,与前边的 winter 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冷飕飕的感觉,表现出温特伯恩阴冷和老于世故的欧洲风格。春天的雏菊遇到冬天的溪流,肯定会因为气候不适而夭折。

洛奇认为,《黛西米勒》是一部表现美国不同阶层的人在欧洲相遇的故事。《黛西·米勒》中的主要对立不是美国人和欧洲人,而是在欧洲的两类美国人:一类是以卡斯特罗夫人和沃克夫人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经常的旅行者和定居者,她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旧世界上流社会的规矩;一类是像米勒一家那样的未受过良好教育、比较粗野、新近成为暴发户的美国旅行者……”(Lodge xvi)洛奇的观点道出了作品中主人公的伦理冲突本质,尤其是从旅行者国籍的层面上来说。因不适应欧洲的自然气候而得病,是《黛西·米勒》中一个重要的象征符码。初到欧洲的米勒一家三口,都先后不同程度地染上欧洲疾病。欧洲的这种自然气候,其实是欧洲冰冷的伦理环境的象征。聂珍钊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 25)。米勒小姐是带着对欧洲的迷恋态度来旅行的,然而当沃克太太、温特伯恩等试图用严厉的欧洲伦理规范来规制她的行为时,她感到了极度的伦理孤独。“伦理孤独是指一个受到迫害的个人或受到迫害的群体中的一员被人类或被那些有权支配其命运的人所抛弃时所感受的隔离”(Stauffer 1)。深处异域孤独的环境之中,米勒选择了伦理的反抗:“我从来不允许哪个男人对我发号施令,也不允许干涉我的行动”(黛西·米勒 45)。米勒小姐不顾温特伯恩、沃克太太等人的伦理放逐,执

意跟一位叫乔瓦耐里的意大利男人夜游罗马广场，结果感染了欧洲古老文明的千年余毒——瘴气。一周后，这位用美国式的天真对抗欧洲伦理世俗的女孩出乎意外地去世了！

米勒小姐不适应欧洲的气候而死亡，这只是悲剧的外表。“故事中的风寒，被表现为只针对黛西的致命威胁。它是一种象征，或者 T.S. 艾略特所称之为的‘客观对应物’，是米勒作为一个女人拒绝遵守为保护她而制定的习俗规则而应遭受的危险”（Lodge xxxvi）。米勒小姐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新来欧洲旅行的美国人不适应那些久居欧洲的美国人所营造的旧世界伦理氛围。“米勒和她的家人违背了卡斯特罗夫人和沃克夫人以各种方式所定制的行为习俗……她们不懂得欧洲的文化和历史，他们的语言也缺乏优雅和修饰……”（Lodge xvii-xviii）。以卡斯特罗夫人和温特伯恩为代表的多年定居欧洲的美国人之所以试图用欧洲伦理风俗来规训初到欧洲旅行的米勒一家，就是担心美国的自然、淳朴、直率的风格会引起欧洲社会的反感，进而把他们这部分美国人也牵涉进去。正如克里斯托夫·威格林所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树立了社会风气的女人……放逐米勒小姐，目的是做给那些观察她们的欧洲人看的，目的是证明她们已经适应了所皈依的社会体制，意识到了米勒式的美国自由是多么的可怕”（Wegelin 61）。

三、《贵妇人画像》——阿切尔小姐的欧洲之行与对婚姻的伦理选择

作为“国际主题”小说的代表作，《贵妇人画像》叙事的典型结构是“大旅行”（Grand Tour）。“这种结构提供了情节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不断变化的国际场景，帮助解释了女主人公活动的主要动机。伊莎贝拉·阿切尔被她的姑妈带到欧洲进行大旅行，于是她作为一个激情的朝圣者来到旧世界，怀着一种浪漫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它反映了作家本人 1869-1870 年间在欧洲进行大旅行时的思想”（Lanzinger 141）。在《贵夫人画像》中，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等构成国际旅行场景的巨大画布，在大旅行的总叙事框架下，文化朝圣、婚姻伦理选择等构成小说的次主题。

阿切尔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渴求知识的印象：“她渴求知识……她对生活充满好奇，总是默默观察思索。她体内涌动着无尽的生命力……（贵妇人画像，33）。为了追求新的生活，阿切尔毫不犹豫地接受姑妈的邀请，离开美国熟悉的家园，到欧洲旅行。然而，从美国奥尔巴尼到英国伦敦的旅行并不能使特立独行的阿切尔完全满足。虽然逃离了美国贫瘠的文化氛围，阿切尔来到英国后又陷入了另一种精神的牢笼，那就是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行为的伦理规范。伦理规范，在聂珍钊看来，就是在伦理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17）。在维多利亚时代，如果一个女人进入男性的空间，将被认为是男性化的女人或者妓女。休·卡宁厄姆指出：“一般认为，

进入公共休闲空间的女性，如果没有丈夫或其他合适的男性陪伴，就是一个妓女”(Cunningham 130)。这种伦理规范的实质就是限制女性流动自由，规范她们成为“家中天使”。

具有独立叛逆意识的阿切尔，显然不愿意受到旅居国这种伦理规范的约束。要打破规制，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走出家庭的束缚，旅行显然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伦理选择。聂珍钊指出，“人类伦理选择的实质就是做人还是做兽，而做人还是做兽的前提是人类需要认识自己……”(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4)。就阿切尔而言，虽然伦理选择不至于是做人还是做兽的根本性冲突，但它却是世俗和开明之间的选择，即是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欧洲淑女还是做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女性。阿切尔选择了后者，主要是受到姑妈耳濡目染的结果。作为一个从美国移居到英国多年的女性，姑妈塔琦特夫人不满足于在家相夫教子的伦理身份，而是通过不断的旅行来打破这种身份规制。詹姆斯·克利福德认为，只从地域的角度无法恰当地理解文化身份，最好通过旅行和运动来理解它们。他指出：“好的旅行(英雄的、教育的、科学的、冒险的、崇高的)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女性不适宜搞这种严肃的旅行”(Clifford 103)。这种男性主义意识下的旅行伦理学，限制了女性的旅行和发展。“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女性在她们的国家之外旅行。到二战的时候，中产阶级的女性也很少有男性想当然地拥有的这种自由”(Tingling 10)。塔琦特夫人就不甘于接受这种对女性的伦理身份规制，而是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伦理规范。正是因为广泛的旅行，塔琦特夫人才没有染上那些久居欧洲的美国人所犯的通病。她不愿像其他移居国外的美国人那样，用欧洲当地的伦理规范来规训阿切尔小姐的行为，而是采取包容的态度。“塔琦特夫人带她的侄女要在欧洲进行一次大旅行……，她想教育自己的侄女成为一个像她一样的世界主义者。伊莎贝拉也拥有一个接受性的大脑，她对新经历持开放态度，也急切地想学习。从这个视角看，她的欧洲旅行也是她的教育”(Lanzinger 143)。

正是在姑妈的影响下，阿切尔的欧洲之行不是逃避美国的终点，而是探索欧洲文化并获得精神成长的起点。阿切尔的欧洲第一站旅行是去伦敦，此行的目的是拒绝沃伯顿勋爵和卡斯珀的求婚。此时的阿切尔，已经完全把婚姻视作自由的伦理牢笼；而旅行对于她来说，则象征着自由和知识。离开伦敦，阿切尔又去意大利。阿切尔对意大利的未知世界充满好奇，认为那是一个充满“无穷知识”的地方。她来到罗马，参观了那里的宫殿和画廊。正是在这些旅行中，阿切尔遇到欧洲化的美国女人梅尔夫人，一个斯芬克斯式的女人。聂珍钊指出：“所谓的‘斯芬克斯因子’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5)。当人性因子占上风的时候，梅尔夫人像一位大姐姐一样陪伴阿切尔在希腊、土耳其等地旅行，使阿切尔的视野更加开阔。当兽性因子发作的时候，梅尔

夫人内心的邪恶爆发，觊觎阿切尔小姐的财富，并与前夫吉尔伯特·奥斯芒德沆瀣一气，把天真的阿切尔投入婚姻牢笼。受梅尔夫人阴险的撮合和奥斯芒德超凡脱俗外表的迷惑，阿切尔在婚姻方面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在四个追求她的男人中，阿切尔没有选择作为善良代表的拉尔夫，而是选择了具有恶魔象征的奥斯芒德。奥斯芒德外表光鲜，心理阴暗。他之所以跟前妻梅尔夫人串通一气来欺骗阿切尔，就是为了占有她从姨夫那里继承的 7 万英镑巨款。这说明，纵使阿切尔通过旅行获得人生的许多知识，但是在欧洲化的美国人面前，她依然是那么天真，最终成为跨文化认知的伦理牺牲品。

四、《使节》——欧洲之行与美国伦理价值观的背叛

不同于《黛西·米勒》和《贵妇人画像》等“国际主题”小说，《使节》不再把主人公定格为涉世不深的美国天真少女，而是一个名叫斯特瑞塞的具有“丰富想象”和“分析能力”的美国中年人。这位中年美国人的欧洲之行，以及所遭遇的欧美文化冲突，也必然异于以米勒小姐和阿切尔小姐为代表的美国天真少女所遭遇的伦理文化冲突。正如亚历山大·皮特所言：“斯特瑞塞，像作家詹姆斯一样，是一个回转型的旅行者（returning tourist），他的旅行不仅使他能够面对面地接触到巴黎的文化地理，而且认识到自己年轻的自我与过去的经历”（Peat 73）。

斯特瑞塞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沃利特小镇的中年男人，奉纽塞姆夫人之命，前去巴黎劝说她的儿子查德回国。在纽塞姆夫人眼中，旅居巴黎的儿子查德在坏女人薇奥娜特夫人的影响下已经学坏。换句话说，查德健全的人性因子在薇奥娜特夫人兽性因子的诱惑下发生了变化，不思回国继承家业，而是痴迷于巴黎灯红酒绿的生活。临行之前，纽塞姆夫人与斯特瑞塞签订了一份荒诞的伦理协定，除非斯特瑞塞不辱使命，否则他将无缘成为纽塞姆夫人的丈夫。斯特瑞塞和纽塞姆夫人的这种伦理纠葛，与查德和薇奥娜特夫人的关系一起，构成小说的两条重要的伦理线和伦理结。聂珍钊指出：“伦理线和伦理结是文学的伦理结构的基本成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发现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是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20）。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一切活动，均在大旅行的叙事框架下围绕着这两条伦理线展开。带着纽塞姆夫人的使命，斯特瑞塞开始了他的欧洲之行。

詹姆斯·巴扎德认为：“詹姆斯笔下的那些到欧洲去的美国人，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在国内未受珍视的价值的蓄水池、以及敏感的美国人的机会和补偿”（Buzard 38）。斯特瑞塞尤其具有这种观念，抱有一种通过欧洲旅行来弥补国内失落感的意识。欧洲的城市，像瑞士的韦威、意大利的罗马和英国的伦敦，总是以阴暗的、迷宫式的丛林姿态呈现在初到欧洲的美人面前，使得即使像斯特瑞塞这样的中年男人也难逃避它的诱惑。巴黎，这个作为欧

洲文化缩影的城市，成为斯特瑞塞经历诱惑的主要地方。在地形方面，巴黎将整个小说框定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二元对立之中；在感觉方面，作为印象主义的堡垒，巴黎拥有“梦幻风景”的气质，激起“完全的、流动的意念之流”（Griffin 112）。在思想上，巴黎代表着不同于斯特瑞塞的家乡沃利特的生活，诱使他去实现在家乡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从小说一开始，旅行空间的重要性就呈现在读者面前。美国沃利特和法国巴黎这两个对立的地域场景，代表着影响斯特瑞塞伦理意识的两种不同价值观。当斯特瑞塞在巴黎第一次遇到玛利亚·戈斯特利这个在各个方面都与沃利特的纽塞姆夫人不一样的女人时，他急不可耐地告诉对方自己来自何方，好像是给自己找一个伦理盔甲来阻挡来自欧洲文化的诱惑。对于斯特瑞塞来说，沃利特这个小镇代表的是一种伦理责任、婚姻方面的安全以及稳定的生活。这种伦理责任通过纽塞姆夫人的信件不间断地体现出来。斯特瑞塞到达巴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到斯克莱布街1号，去取纽塞姆夫人的信件，那些信件的标号、长度和语气时时提醒斯特瑞塞不要忘记自己欧洲之行的伦理使命。但是，随着斯特瑞塞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旅行，他对美国沃利特小镇所代表的伦理文化背离态度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他选择玛利亚·戈斯特利作为欧洲旅行的导游的时候。戈斯特利这个名字的英文拼写是 Gostrey，与 go stray（误入歧途）这个词组正好是谐音。从玛利亚·戈斯特利那里，斯特瑞塞学到了一种选择性旅行的方式。他参观了欧洲美丽的地方和著名的古老建筑，摆脱单纯的旅游者行为，学会在欧美两种文化的接触中做出明智的伦理选择。正是在玛利亚·戈斯特利的引领下，“他走出了第一步，放弃了关于欧洲的沃利特观点，采取了一种开明地对待欧洲文化的态度”（Peat 75）。斯特瑞塞到达欧洲后所发生的变化，自然表现在他对纽塞姆夫人的信件所采取的态度方面。整个巴黎之行，记载的是斯特瑞塞沃利特伦理道义的崩溃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到达巴黎的第一周时间里，斯特瑞塞已经感觉到了巴黎自由的力量。像在巴黎的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斯特瑞塞受到巴黎的美感和古董的诱惑，对巴黎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情愫。“对于斯特瑞塞来说，欧洲的这些令人愉快的东西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同样与欧洲风景深刻地融合在一起的是他内心的图画”（The Ambassador 13）。

作为一个具有智慧和敏感的旅行者，斯特瑞塞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特殊的情感”正与他的欧洲之行的时间和地点产生巧合。地点就是巴黎，时间是斯特雷瑟的55岁年纪。具有艺术家的敏感性和感知能力的斯特瑞塞，要趁人生的蜡烛还没有燃尽的时候来一次幻觉的旅行。对于此时的斯特瑞塞来说，巴黎的每一座房子、每一个花园和教堂，都失去了客观的特性，成为一种主观的价值、诗性的浪漫。不过，在出使巴黎期间，斯特瑞塞也经历了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斗争，陷入与薇奥娜特夫人的不伦之恋和艰难的伦理选择。在逃离纽塞姆夫人颐指气使的伦理控制的同时，斯特瑞塞逐渐迷恋上

了欧洲优雅文化的体现者薇奥娜特夫人，在明知薇奥娜特夫人是查德的情人的情况下仍然对她发生了非分的情感，这是他内心兽性因子作祟的结果。但是，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和地理景观最终战胜了斯特瑞塞内心的兽性因子，使他最终做出了明智的伦理选择。他理智地割断对薇奥娜特夫人的非分之想，毅然选择离开巴黎，但是又拒绝回到紐塞姆夫人身边。同时，斯特瑞塞对查德在兽性因子驱使下对薇奥娜特夫人始乱终弃的行为表示严厉的谴责，要求他重拾人性，与薇奥娜特夫人和好如初，继续留在巴黎享受人生。至此，斯特瑞塞这位美国“使节”彻底地“变节”了。导致他“变节”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旅行将他投掷到欧美两种伦理文化冲突的氛围中，最终是欧洲的魅力战胜了来自美国的伦理责任和使命。

聂珍钊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能够同其它一些重要批评方法结合起来，例如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心理学的批评方法、政治学的批评方法、心理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等等”（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21）。文学伦理学与旅行伦理学的有机结合，是研究亨利·詹姆斯旅欧小说的必要途径。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具有典型的旅行叙事的特征，反映了美欧大旅行时期美国人在欧洲的旅行和伦理文化认知经历。詹姆斯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美国人，虽以天真浪漫的美国少女居多，但也不乏具有一定世俗阅历的中年人。他们带着伦理文化认知的梦想或来自美国的使命去欧洲旅行，最终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欧洲伦理文化的牺牲品或者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下实现了意识的觉醒。不过，加入了英国籍的詹姆斯显然不想让欧洲人说自己是“身在欧洲而心在美国”的文化骑墙派。所以，在揭示欧美两种文化的旅行和碰撞时，他有意把这种欧美伦理文化的冲突框定在初到欧洲的美国人和久居欧洲并被欧化的美国人之间。这就更加隐晦地暗示欧洲伦理文化的世故、复杂、开明等多元性。

Works Cited

- Buzard, James. 1993. "A Continent of Pictures: Reflections on the 'Europe' of Nineteenth-Century Tourists." *PMLA*, Vol. 108, No. 1 (Jan., 1993): 30-44.
- Clifford, James. "Travelling Cultures." *Cultural Studies*. Eds. L.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Routledge, London, 1992. 96-116.
- Cunningham, Hugh. *The Leisur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80-188*. Croomhelm, London, 1980.
- Griffin, Susan. *The Historical Eye: The Texture of the Visual in Late James*. Boston: Northeastern UP, 1991.
- Haralson, Eric & Kendal Johnson, eds. *Critical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 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9.
- Houser, Zelma Large. "Early Years of Henry James." *Mark Twain Quarterly* 8.3 (Winter, 1949): 9-10.
- Howells, William Dean. *Mr. James' Daisy Miller: Heroines of Fiction*, Volume II.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01.

James, Henry. *The Ambassado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03.

Lanzinger, Klaus. *Jason's Voyage: the Search for the Old Worl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 Study of Melville, Hawthorne, Henry James and Thomas Wolfe*. New York: Peter Lang, 1989.

Larsen, Erik. *The Tacit Other: Identity and Otherness in two Texts by Henry James*. Athens: Odense UP, 1998.

Lodge, David. *Introduction to Daisy Miller: A Study by Henry Jame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7.

Munch, Marcus. *The International Theme: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 Types in the Tales of Henry James*. Munich: Grin Verlag, 2007.

Peat, Alexandra. *Travel and Modern Literature: Sacret and Ethical Journey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1.

Stauffer, Jill. *Ethical Loneliness: The Injustice of Not Being Heard*. Columbia UP, 2015.

Tingling, Marian. *Women into the Unknown: A Sourcebook of Women Explorers and Travellers*.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89.

Twain, Mark. *The Innocents Abroad, or the New Pilgrims Progress*. New York, 1980.

Wegelin, Christof. *The Image of Europe in Henry James*. Dallas, Southern Methodist UP, 1958.

Zabel, Mordon Dauwen. Ed. *The Art of Travel: Scenes and Journeys in America, England, France and Italy from the Travel Writings of Henry James*.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 1958.

亨利·詹姆斯：洪增流、尚晓进译，贵妇人画像（上）。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

[James, Henry. *The Portrait of a Lady*. Vol.1. Trans. Hong Zengliu & Shang Xiaojin. Beijing: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9.]

——：聂振雄译·黛西·米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1983年。

[—, *Daisy Miller*. Trans. Nie Zhenxio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台北：秀威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Other*. Taipei: Showwei Press,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 (2011): 1-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1-13.]

——：“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 16-24.

[—, “Ethic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 New Perspectiv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4):16-24.]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asic Theory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责任编辑：张连桥